校友校友

翠袖乾坤　文潔華

近年多了一個身份被標榜和推廣，就是校友。

小學、中學和大學都在仰賴校友會的支持，包括物料上的贊助和捐助以擴建校舍，舉辦各種活動，還有贊助學金。非物質的支持亦有以義務導師的身份指導在學幼輩，分享專業知識甚至人生經驗。校友們處於年長的人生階段，也會珍惜從前在學日子的各種因緣，亦樂於把自己所獲取的回饋母校。

大學甚至設立校友事務處，幫助各系各院組織校友會，每年都舉行校慶表演及祝賀宴會，以聯繫多年失散、移居海外的校友。

一位大學校長至為感動者，乃每逢到訪美加各大城市，校友們皆風聞而至，老遠跑來相聚；即使跟新任校長素未謀面，母校的一切皆與自己有不解之緣，那份感情跟當年康有為團結海外華人為祖國出錢出力性質相近。

校友身份以及對母校的情誼，也是預設了條件和基礎的。我的一位友人便非常不喜歡自己的母校，因為回憶中都是沉悶、責備與惡性的競爭。

她認為母校過於精英主義勢利，對平庸者不屑一顧。她甚至對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年月就讀於此校感到遺憾與惋惜。但更多人在營營役役了半生以後，對於那些識於微時的純真情誼感到份外親切，在重聚中彷彿希望生命可以從頭再來一趟，是故「那些年」一類的電影除了吸引年輕的觀眾，便是中年及後中年的觀眾。

這情況同樣出現於校友的組群，可以猜想母校六十周年慶典，捧場客都是近數年畢業的，以及早卅年或更早年畢業的，奇怪是早十年畢業的是稀客。他們不是忙於求成，便是追求別些身份。

喬布斯成長為發明家的原因（下）

古今談　范舉

喬布斯綜合了科學發明家、行政總裁、設計家、商業投資家各種出色的才能。能夠把上述各種材幹綜合在一起的人才，並不多見。這和他所處在的時代和成長的環境很有關係。

第六，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第一代電腦當時已經出現，並且提供給中學生使用，喬布斯在這樣的環境下，有機會使用電腦，並且學會了製作電腦程序。他身邊的同學都是這樣的電腦迷，形成了一個互相啟發、互相競爭的環境。

第七，在一個非常偶然的環境下，喬布斯問及神父，上帝知不知道非洲地區有兒童面對着饑荒捱餓？神父說，全能的上帝甚麼也知道。喬布斯並不相信上帝會知道這些事情。所以他把目光轉向了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尋找東方的哲學智慧。他的童年由於失去了親生的父母，非常痛苦，也感受到壓抑，希望追尋身世之謎。他期望找尋自我，尋求解脫。在禪修過程中，他學會直覺的思維和頓悟，直觀地感悟周圍未知的人性和社會情緒。這是西方邏輯思維所沒有的靈感來源。

由於擁有了人文科學，又擁有了理工科學的知識，這兩種科學技巧結合起來，就增加了喬布斯的好奇心、想像力和創新能力，他能夠把新的科技轉為為消費者服務的設計得最好的產品，這些產品首先考慮是使用者的需要、方便、舒適，以客為本。

第八，喬布斯的養父擁有豐富的機械設計的知識，而且又是一個修舊利廢的專家，經常帶他到好像深水埗鴨寮街那樣的廢品二手市場，找尋發電機和電子零件，善於討價還價，喬布斯自小耳濡目染，年紀很小就懂得了成本計算，懂得賺錢和找尋商業機會，很有商業頭腦。這樣有利於成為一個精明的行政總裁。

第九，美國的中小學教師的師資水平很高，小孩子形成思想和創新能力主要在中小學的階段。喬布斯遇到了一位小學好老師，懂得用鼓勵的方法引導頑皮而聰明的學生，鼓勵他向數學發展，喬布斯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數理科目的成績就達到高中二的水平。在香港，一直以考試篩選作為教育的主要手段和目標，中小學教師的師資質素又不高，所以香港中小學的基礎並不扎實，要培養出喬布斯那樣的人才並不容易。

第十，美國政府對高科技大量投入，對大學的研究經費則由企業投入，讓有才能的、善與創業的年輕人，有良好的出路。喬布斯那一代的年輕人，大批量地成為發明家。香港的科研經費不足，企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對投放在科研和設計領域的資金很少，即使有科技才能的人才，也沒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美國重點發展金融衍生產品，大力搞金融創新，逐步革新，大量精英的學生，報考金融管理和法律系，理工科人才的隊伍逐步減少。美國民間已失去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當工程師為榮的氣氛和環境。

街道和沙律的「會意」

琴台客聚　葉輝

也斯的詩集《形象香港》（City at the End of Time）的英譯本即將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有幸參與為這本詩集而設的座談會《在時間伊始的四重奏》，在會上提出一些想法。這本詩集有很多廣義的詠物詩，其中兩首所「詠」的，是兩條很有意思的街道——《花布街》及《鴨寮街》，在我看來，那是兩條形象（或意象）相對極端化的街道。

我們在花布街上看到各式各樣的布匹，布匹剪裁成的衣服，穿在不同人士身上，而這些衣飾又成為我們看到的城市流動風景。花布之中既有中國風，卻又不完全是中國風，而是由又東又西拼湊而成的形象組成新的衣裳。此詩最後以疑問作結……

鴨寮街本身經歷過不同轉化，本來賣舊東西，後來變成賣電腦配件；這跟花布街恰好相反，花布街要有傳統和時間的累積，鴨寮街卻需要時間的更新。這兩首詩互相對照，或可看到香港的混雜性，卻又未至於與傳統完全脫節。

我讀到《青菜沙律》，倒想到一些三四十年代中國詩人所討論的「頓」，或「音尺」，即二字尺、三字尺——五言詩是二三頓，七言詩大多是二二三頓；讀《青菜沙律》，有如吃一盤沙律——在這盤沙津中可以在其中找出一些奇怪的詞，不是常見的二字或三字的「頓」，而是四字的，例如「詭秘顏色」、「情盡意竭」、「叢叢黎明」、「疊疊層層」，當然也可以將之分為二二頓。

這些詞中大多是成語或日常熟語，一般認定那是一首詩要避開的詞語；然而一盤沙律就是把不同的東西混在一起，各種食材放在特定的容器中，此詩的空間就像沙律裡不同食材形成的空隙，但那不是圖像詩，多元的味道紛陳，那是怎樣的味道呢？我想，那應該是從「象形」到「會意」，從「指事」到「形聲」的味道吧——如此說來，古老的「六書」原來也可以為詩帶來新鮮的想像。

花布街和鴨寮街就像兩盤不同風味的沙律，互相對照的蒙太奇，兩者之間，是挑選與剪裁，是混雜與融合，從而交織出香港形象的「會意」。「東西」這個詞亦是如此，一個東一個西，把兩種或多種不同的物事併混在一起，從而產生新的味道和新的意思。東西可以譯作 east and west，也可譯作 things，然而「東西」比 things 有着更多想像空間，包括既不是東也不是西的，將兩件東西合併，就是「東西」，此所以是「會意」，兩者也互為「指事」，從而展佈不同風味的蒙太奇。

也斯的詠物詩不止詠物，而是在詠物的過程中找尋新的觀看與思考的角度，讓我們與詩人一起得到啟示。我選擇了「啟示」一詞，而不用「影響」，大概是為了避開一些文化比較的理論。我們每每談到文化研究，都會不自覺地討論抽象的概念，然而倒要想想，這些概念從何而來？

或者可以說，概念都是透過文化觀察，深入事物本質，找出特點，經過研究，得出結論。詩則相反，注視這些事物，經過取捨，尋找角度，變成詩的語言。本雅明不會空談理論，只是透過觀察和閱讀，整理想法，他的理論倒是由後人整理而成。用詩寫文化感受，更像上世紀初的歐洲人在充斥着物和物質的街上閒逛，思考和感受街上看到的物事，再轉化成文章或詩篇，例如波德萊爾把他的城市觀察加以整理，於是寫成《巴黎的憂鬱》。

我的交響樂是墓碑

百家廊　王璞

肖斯塔科維奇是前蘇聯最偉大的作曲家。他二戰時創作的第七交響樂，又稱《列寧格勒交響樂》，二戰年代享譽東西方。據說，斯大林跟來訪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威爾基談到開闢第二戰場問題時，對方卻道：「肖斯塔科維奇是個偉大的音樂家。」這回答聽似顧左右而言他，其實甚具外交智慧。言外之意：你們有肖斯塔科維奇就夠了，用不着我們開闢第二戰場也能打贏這場戰爭。

當然，威爾基們也是從蘇聯官方對第七交響樂的角度解讀這部作品的：它描寫的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之精神。這種精神感召全世界的民主力量抗擊法西斯希特勒。不過這卻並非作者本人的創作動機，在這位偉大音樂家死後出版的口述回憶錄《見證》中，他這樣寫道：

「我毫不反對把《第七》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樂》，但是它描寫的不是被圍困的列寧格勒，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壞、希特勒只是將它最後摧毀的列寧格勒。」

「我的交響樂多數是墓碑。我國人民死在和葬在不知何處的人太多了（就連他們的親屬也不知道）。我有許多朋友就是這種遭遇。到哪裡去為梅耶霍爾德或者圖哈切夫斯基建立墓碑？只有音樂能為他們做這件事。」

表面上看，肖斯塔科維奇度過了輝煌的一生，他是斯大林時代唯一既獲得蘇聯官方各種「殊榮」，同時又得到西方無數榮譽稱號和獎項的藝術家；但當他自知即將告別人世時，他卻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

「在我一生中，沒有特別愉快的時刻，沒有極大的歡欣，這是暗淡沉悶的一生……我的生活充滿了憂傷，很難找到比我更不幸的人……」

於是他回憶朋友故舊，以為能以此排遣愁苦， 誰知卻愁上加愁：

「我一開始回憶我的朋友和熟人的生活便不禁不寒而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的生活是輕鬆的或者幸福的。有些人結局悲慘，有些人在極大的苦難中死去……我看到的只有屍體， 堆積如山的屍體。我沒有誇張，的確是堆積如山。這幅景象便令我充滿了恐怖的抑鬱。」

他的朋友名單顯赫，他們儘是當時各行各業的一流人才，其中不乏元帥、藝術家，甚至大師，但他們不是死於非命，就是雖生猶死。六十年代末，當媒體安排他與另一位大師級人物阿赫瑪托娃會面時，場面耐人尋味：這兩位都曾表示過欣賞對方作品的藝術家，卻默默相對，不發一言。

阿赫瑪托娃的代表作是長詩《安魂曲》，人們評說那是一座對斯大林恐怖年代遇難者（包括她的兩任丈夫和獨子）的紀念碑。

鎂光燈照着這兩位墓碑作者，人們希望拍下歷史性的畫面，至少也應當有些戲劇性的鏡頭，但他們只是靜靜對坐，呆若木雞的表情，令人想起從一場浩劫中死裡逃生的倖存者。

墓地般的肅靜。

身為墓碑作者，他們眼前所見的，正如《見證》中所言「除了一片廢墟，我甚麼也看不到，只有屍骨如山。」對那些盤繞在他們心中揮之不去的冤魂，說甚麼好呢？ 惟有沉默。

一股悲愴之情充斥着這本口述自傳，這也是充斥着肖斯塔科維奇大部分作品的情緒。鬥志昂揚的理想主義者們攻擊他是個悲觀主義者，可是他「並不為此傷心，因為我所喜愛的人——果戈里、薩爾蒂柯夫．謝德林、列斯科夫、契珂夫、左琴科——全都遭到同樣的詆毀。」何況，在斯大林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悲傷也是一種權利。暴政死難者家屬沒有為親人悲痛的權利，給了他們悲傷權利的，竟然是那場戰爭。

因為，二戰前列寧格勒就變成了一座悲痛之城，沒有一個家庭不曾因斯大林的大清洗遭到喪親喪友之痛，人人都有為之一哭，但大家都只能默默飲泣，蒙着被子哭，彼此戒備，為之窒息， 大家都是受害者，但每個人又都可能成為告密者。

戰爭幫了忙，戰爭使悲傷名正言順，現在不怕公開讓眼淚掉下來了，現在可以為失去的親人哭泣了。《列寧格勒交響樂》， 以及隨後而來的《第八交響樂》， 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才得以誕生，借哀悼戰爭的死難者哀悼大清洗的死難者。

既然是見證，那就必須說出真相。但從那時代過來的人都給嚇傻了，大部分的人「準是因為營養不良得了健忘症」，因此而導致的集體失語症，使得少數精神健全者也對自己的記憶失去了信心，肖斯塔科維奇之所以屢犯天顏還能碩果僅存，不斷地以自己的音樂樹立起一塊塊墓碑，只是因為他得天獨厚，地位特殊。

不過他並沒有利用這種地位像薩哈羅夫一樣作個持不同政見者，也沒有像索爾仁尼琴一樣流亡海外，他遵從斯大林的旨意出國訪問、答中外記者問，在各種大會上宣讀官方講話，甚至跟眾多音樂家一起參加「音樂集體農莊」奉旨寫作國歌。後世的人會問——不，他活着時就有人這樣問了：你為甚麼要作這件事那件事？你為甚麼要說這句話那句話？你的良知到哪裡去了？

即便是在這本死後才敢出版的回憶錄中，肖斯塔科維奇也沒有正面回答這些問題，他只是不斷地抒發着一種感覺，恐懼。恐懼這個主題，將那些看似散亂的回憶連成一體，在這整本書中和他整個一生中，恐懼的音符都在其中不斷迴旋，恐懼迴旋曲，我想到這個詞組。

■ 肖斯塔科維奇　網上圖片

真相是：「恐懼是當時所有人的共同感情，我也攤上了一份。」

真相是：「我完全被恐懼束縛住了，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的過去已經被一筆勾銷，我的工作和才能對任何人都沒有價值了，看來未來的淒涼不會稍遜於現在。」

在一個被恐懼抓住的人面前，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自殺， 二就是與劊子手妥協。

作為舉世矚目的音樂家， 肖斯塔科維奇還有第三條路，他與劊子手妥協，活下來用音樂表達他的心聲。

然而這麼做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比慘死於劊子手屠刀下更為沉重的代價：日日夜夜、一輩子的心靈煎熬。擺在我們面前的這本書就是這種地獄般煎熬的見證。肖斯塔科維奇晚年的作品主題是死亡，「死亡是全能的。」這種調子把他僅剩下的朋友也得罪了。他形影相弔，他自言自語：「若要避免孤獨，我衷心勸世人找一隻狗作伴。」當我在《見證》的結尾部分看到這句話， 我好像看到了作者那顆慘遭蹂躪千瘡百孔的心。

深邃難忘

生活語絲　阿杜

當年阿杜與林冰（娛圈教母）分掌嘉禾和邵氏兩大華語製片機構的宣傳部，同行不如敵國，私底下是知交好友。九十年代中期香港電影式微，拍戲方面邵氏、嘉禾都半停產。那時我們常私下飯敘交流聊天，說起互掌宣傳部均近三十年，冰姐說在工作過程中經歷過四位公司藝人同事之猝死，分別是秦劍、李婷、白小曼和黃宗迅。俺說我這邊有李小龍、樂慧、陳寶蓮、康妮（亞姐改入嘉禾之準新星）和梁思瀚。

冰姐說，她列舉之四命，除了黃宗迅死於車禍，另三人全為自殺。我說嘉禾這邊也除了李小龍猝逝於心臟窒息，其餘也全為自殺。真是無獨有偶，可見演藝之路並不易行。全皆要甚健全之心理素質和意志堅強才能撐下去。

說起來，我們皆認為上述人中命途坎坷曲折是李婷和梁思瀚。李婷是六十年代邵氏南國訓練班培養之新星，天津人，父親是老電影人，長年臥病靠她微薄月薪維持。她長得溫文美麗，和一個窮攝影師苦戀，某夜因母貧父病，自己事業愛情不如意，百感交集自縊斃命。寫下遺書只有四個字「救我爸爸」。單身宿舍中無人敢進去由廁所樑上解下來，當時做編劇的丁善璽（後來做了大導演）進去解下，用大量白花油牛黃丸等灌吃都不靈。她在醫院臥病之老父聞訊包一部小巴急駕入宿舍，一下車人人皆見小巴車牌特大車號是「九五八八」四字。李父站在車牌旁泣淚，人人看見都呆了。車號旁正是「救我爸爸」，和遺書一樣。

丁善璽見義勇為替李婷辦好出殯安葬籌了一筆錢給她父母。一個月後他要返台北工作辭別邵氏，最後一晚有一個長髮白影「飄」入宿舍跪在他床前不走，跪足了一晚。此事丁氏做導演後記之甚詳。當年被視為影界異聞之一。時至今日已過了三四十年，仍然深刻難忘，蝕緒之深比那九把刀懷念「追過的女孩」深邃得多了。

菜賤傷農

一網打盡　楊振耀

新聞圖片顯示北京大興區菜蔬收購站上，一位菜農站在貨車旁邊，看着丟滿一地的大白菜一臉無奈。原本大白菜產量和去年差不多，但今秋卻集中上市，造成供過於求，結果是大白菜滯銷。收購價格從去年每斤一元多，跌到現在的約幾毛。菜賤傷農，採購商還要本事把白菜逐棵挑，不合格貨色都丟到地上。菜農如果把剩菜運走，還要貼上汽油錢。雪上加霜的是除了收購價下跌，菜農得與時間競賽，在天氣進一步轉冷前餘下的再賣不出去，就只有留在田間被凍壞，省得再花勞力收割。預計菜價會如氣溫一樣，是一天一天向下調。

由於市場訊息不流通，絕大部分個體小農只有參考去年政府的鼓勵方針與補貼價格作出今季選種瓜菜的決定，傾向選種補貼價格和收購價較高的菜蔬是理所當然，俟收成時同一品種大量供應市場的機會絕對地大。原意是出賣勞力換取生活費，最終是務實的農戶成了賭徒，辛苦一場還要等待農作物應市，市場開的會是紅盤或黑盤？對農戶來說，希望只有一個，就是有人可以告訴他們來年種甚麼最能賺錢，當然如政府能作出種植的協調工作，對平衡供求還是最有效的。

近年鄉鎮城市化與城市所能提供的各種工作機會，已淘空了不少鄉鎮的年輕勞動力，留下的較年長的農民如找不着生計，只會進一步鼓勵鄉鎮把集體用地用來建房。即使建成後賣不出去，建造期間所能提供的短期工作崗位及提高帳簿上的土地價值，對地方政府來說就是出色政績。問題是建房用地與農地存在競爭，幹部交出成績，房子卻賣不出，農民又靠甚麼維生？

下午行走

記憶後書　鄭政恆

吃飽了，就出發。二時，我迎接晚秋的下午，一年中僅餘的炎熱日子。應該穿短袖的衣裳，但我穿了長袖的上衣，只好拉起衣袖。

路線有點隨意，就是想走走路。先到石峽尾看Blues Wong（黃啟裕）策劃的攝影展，再往九龍塘逛一逛。

從九龍塘走到樂富，路途有點遙遠，中間的軍營無法穿越，必須繞道而行。方法一比較近，經過浸會大學和聯合道公園就成。方法二遠一點，經過浸會大學和九龍仔公園，再沿聯合道北上。結果我選了遠路，因為想看一看陌生的風景。

九龍仔在九龍城與九龍塘之間，我一直缺乏運動，平常也不會來，印象中，初中時來過這裡一次，很例外，因為絕大部分的運動會都是在灣仔舉行的。

九龍仔公園有好幾個足球場，球員在兩邊來回奔跑，攻來守去，踏着陽光。我也踏着陽光，想到我還不熟悉的地方實在太多，香港明明是小城，卻好像走不遠似的，總有未曾踏足的地方，在某個角落，等待隨意的發現。

不久我就到了樂富，聽一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朗誦會。因為我花了太多時間散步，朗誦會已過了差不多一半，只聽到一小段德國詩人的作品，然後登場的是王良和老師，真巧，剛剛好。

很久沒有見到老師，他朗誦的聲音一貫悅耳，讀了好幾首我熟悉的佳作（晨雨、尚未誕生、聖誕老人的故事、這是最後一天了……），當然我更期待老師帶來新的作品。

和老師、師弟、師妹吃過晚飯，再出發。銅鑼灣Bauhaus Shop三樓有「重複．回憶」繪畫作品展，這幾天有淋浪、淋漓和張浩強的聯展，聯展過後是三人各自的個展。他們的風格不同，放在一起更見多樣性。

回到家裡，大概是十時多，完成了八個多小時的豐足的旅程。